宋辽金山西文学概论

从辽朝建立（907）至南宋灭亡（1279），在这近400年的历史时期中，我国经历了辽、北宋、金、南宋四个朝代，战乱频仍，阶级矛盾尖锐，民族关系错综。山西文学家全面、真实、生动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和人民疾苦，以及各族文人的复杂心态。从文学体裁的发展来看，这一时期是我国古典文学由雅趋俗、向近代演进的关键时期。宋词的崛起和繁荣，话本小说的登上文坛，宋金杂剧、院本和诸宫调的兴盛，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以及金代散曲的形成等等，均标志着这一重要转化。山西文学家在各种体裁的创作方面都有较大贡献，尤其是夏县司马光、闻喜赵鼎和忻州元好问、浑源雷渊等，成为这一时期先后辉耀文坛的明星。

一

宋代从开国起，就先后遭受着辽、夏、金的严重压迫和侵略，成为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中最软弱无能的朝代。山西从北宋早期起就一直是宋辽两国交兵的主战场，到南宋政权偏安江南一隅，山西沦为金国的一部分，更是遭受着沦亡的屈辱和苦难。在这块土地上，杨家将父子曾血染疆场，谱写了一曲前仆后继的英雄壮歌，成为当时及后代文艺作品的重要内容。北宋时期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文彦博、司马光等，都曾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山西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抗敌斗争事迹。南宋名臣赵鼎和词人王安中等，在他们的作品里，用豪放悲壮的调子，描写故国山河之恸，表现强烈的“爱国”思想，一扫过去那种绮罗香泽的气息和缠绵柔媚的情调，使词的内容和风格大大得到充实和提高。他们代表着这个时期山西籍文学家的主流。另外，还有太原人郭若虚和王诜，分别是著名的山水画家和绘画理论家。代州人毕仲游，也有大量文学作品传世。司马光、王诜、米芾及米友仁父子、赵鼎、王安中的词数量多，但风格明显不同，可以看出北宋词向南宋词过渡的差异和区别。

（一）

北宋王朝初创，时局动荡，战乱频仍，许多人都是在忙于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缝隙中偶尔吟诗赋词，所以在文学上的成就不大，作品数量很少。真正在政治上和文学上有所建树的则是介休人文彦博。

文彦博（1006—1097），字宽夫，汾州介休人。自幼聪颖好学，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进士。青年时期做过翼城知县、绛州通判、殿中侍御史。宋夏争战发生后，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亲赴军前，考察边情。他曾上疏仁宗皇帝，历陈北宋军事边防上的弊端，提出改进措施，很受仁宗器重，于庆历七年（1047）被提为参知政事，两年后升任宰相。他尊重人才，重用贤能，王安石、司马光、曾巩、文同等有才之士都曾受过他的举荐。神宗即位时，文彦博已年逾花甲，但是他从不以朝廷重臣自居，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熙宁二年（1069）神宗为称遇贤之意，每次朝会让宰相陈升之位居文彦博下，他执意不肯，认为不能自行破坏朝廷的礼仪法规。元丰年间（1078—1085），年近八旬的文彦博请求告老致仕，神宗一再挽留，并赐诗袖赠：“四纪忠劳者，三朝闻望隆。亭兹难老祉，报在不言功。富矣勋弥大，居焉貌甚冲。四都旧士女，白首佇瞻公。”诗中既高度评价了他卓越的功勋，又赞扬了他谦虚仁惠的品德。他还擅长书法，笔势清劲，古朴浑厚，范纯仁曾写诗赞道：“四朝勋业载旗常，九十精神正寿康。熙翼自当传百世，岂徒书法付诸郎。”绍圣四年（1097）卒，谥忠烈。

文彦博著作今存《潞公集》40卷，以诗歌最具特色。苏东坡曾云：“文丞相综理事物，虽精练少年有不如。其贯古今，虽专门名家不逮。潞公长律，无一字无考据”。可见他在诗歌上用力甚专，功底深厚。

留心边情事务，关怀前线将士的苦寒，反映边塞的斗争生活，是位居人

臣之尊的文彦博首先关注的问题，也是他诗歌题材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曾亲赴寒塞考察军情，也曾多次送将士出征。在诗歌里，他颂扬战士们杀敌卫国的爱国精神，更多的诗则表达了他对因战争而造成的离别之苦的同情。如《塞下曲》：“朔漠凝寒久，穷荒气候赊。冻云藏虎谷，残雪满陇沙。地迥胡风急，天高汉月斜。何人动乡思，垅上听金笳。”《关山月》：“宕子久行役，辽西戍未还。佳人怨遥夜，清泪浥朱颜。蘚晦兰闺寂，尘昏宝鉴闲。相思不相见，明月下关山。”反映的是边塞的苦寒和战士的乡思情思。又如《从军行》：“汗马出长城，横行十万兵。晨驻左贤阵，夕掩亚夫营。雪压龙沙白，云遮瀚海平。燕山纪功后，麟阁耀鸿名。”《贺经略太尉相公玉汝移镇太原》：“北首并州路，旌幢拥画轮。万兵严从后，百吏拜前程。汉相仪形重，尧风气俗淳。政成期月报，四海望洪钧。”在这些诗里，已看不见哭啼的眼泪、缠绵的情思，而充满着慷慨激昂的精神、渴望建功立业的思想，给人一种振奋的力量和博大的雄风。

咏史诗是文彦博作品的另一个重要内容。这类诗大多随感而发，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评价，来启发人们思考和借鉴，达到有利于现实社会的目的。如《长平怀古》：“此子徒能读父书，兵降始信蔺相如。却今后代承学者，每到长平戒覆车。”讽刺志大才疏、言过其实的赵括于长平一役被秦将白起坑杀赵卒 45 万。又如《题筹笔驿》：“卧龙才起扶世衰，料敌谋攻后出师。帏幄既持先圣术，肯来山驿旋沉思。”《登骊山知连理木》：“长生私语都无益，芳树交柯自表奇。就使玉真如素愿，山阴拱木竟何知。”《题韩信》：“韩信未遭英主顾，萧何亲至此中追。君王有意争天下，不得斯人未可知。”《玉阶树》：“亭亭依玉砌，郁郁尽琼枝。璧月夜虽照，金风秋更吹。陈宫唯是唱，汉殿只应悲。似有君轩恋，岁寒终不移。”针对诸葛亮、唐玄宗、韩信、陈后主等历史人物抒发的感慨，让人们记取创业的艰难和亡国的教训，字里行间渗透着世事沧桑的慨叹。《阅史有感》则直接抒发自己的历史观：“缥帙青箱次第开，慨然英气转难裁。莫言每事俱长往，须有清风属后来。弹铗始知皆锁旅，枕戈方信是雄才。平生自况真非薄，只是休容楚鸠媒。”表达了历史为当时政治服务的思想。在这些诗里，也有一些是针对当时政治混乱而发的，但不多。如《题榆次县鼓楼》：“置向谯楼一任挝，挝多挝少不知他。如今幸有黄绸被，努出头来放早衙。”勾画了一个懒散的地方官形象，与文彦博勤政爱民的政治思想形成鲜明的对比。

文彦博一生出将入相，涉足大江南北，每至佳处，必有诗以记山水田园之美。因此他的集子里除了较多的应酬诗之外，写景诗占有很大的比重。

些诗大多都信手拈来，随口吟出，因此显得言浅意显，清丽秀朗。如《华月》：“皎皎新秋月，分明照洞房。几人千里别，今夜九回肠。皓彩穿珠幌，澄辉上璧珰。画楼兼绣户，浑是可怜光。”《见山楼》：“云淡天迷楚，楼高地占秦。哀筝两行雁，小字数钩银。巷陌三条月，池塘十步春。府门初夜闭，多少夜游人。”《小园即事》：“闲脱蕉衫挂树桠，竹冠芒履自耘瓜。心形散傲如园吏，捭阖纵横似酒家。古桧婆娑张碧盖，流泉诘屈动青蛇。风清日落未归舍，待得东南见月华。”《春日湖上偶作》：“地胜当春早，身闲爱景幽。微风吹积水，尽日飘虚舟。客至解悬榻，鱼来避直钩。机心本不动，犹恐骇群鸥。”这些诗或写明朗的月亮，或写夜游的景色，或写小憩时种瓜的喜悦，或写闲暇时得意忘筌的玄机，完全脱离了酬酢的官场气息或典故的堆砌，洋溢着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青春气息，读之亲切可爱，意味深长，是文彦博作品里难得的好诗。

稍早于或与文彦博同时的山西诗人值得一提的有：王溥、王嗣宗等。王溥（922—982），字齐物，并州祁人。后汉乾祐元年（948），他26岁，得中状元，被封为秘书郎。后周太祖郭威即位后，王溥因平息军阀叛乱有功，32岁就擢升宰相。柴世宗二年（955）正月，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王溥俯首称臣，得以保留相位。赵匡胤曾对左右说：“王溥十年做相，三迁一品，福履之盛，近世未见其比。”王溥是五代至宋初的著名史学家，周恭帝时，主纂《世宗实录》40卷。以后又修成《唐会要》和《五代会要》，史料价值极高。王溥的文学作品大多已失传，现存的少数作品散见于一些类书中，以诗歌著称。如《咏牡丹》：“枣花至小能成实，桑叶虽柔解吐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语言浅显，寓意丰富。又如《谢进士张翼投诗两轴》中云：“登山始觉天高广，到海方知浪渺茫”，浑厚雄放，颇有气势。王嗣宗，字希阮，汾州人。开宝八年（975）进十廷试时，他与赵昌言同时交卷，赵匡胤命二人角斗，嗣宗胜，遂为状元。曾知陕州等地，为人豪放不羁。有《题关右寺壁》诗：“欲挂衣冠神武门，先寻水竹渭南村。却将旧斩楼兰剑，买得黄牛教子孙。”苏轼谓此诗真率自然，妙得天趣。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杨家将父子，他们虽然不是文学家，但却是许多文学家创作的生活原型。杨继业、杨延昭父子杀敌报国的英勇事迹，主要发生在山西北部古战扬。至今密云县古北口仍保留着北宋时修的杨继业庙。北宋诗人苏颂有《和仲巽过古北口杨无敌庙》为证：“汉家飞将领熊罴，死战燕山护我师。威信仇方名不灭，至今遗俗奉遗祠。”千百年来，出现了许多以杨家将故事为素材的小说和戏曲，如《杨家将演义》、《四郎探母》、《穆桂英挂

帅》、《辕门斩子》等，成为民间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

北宋在真宗、仁宗时得到休养生息，树立了比较稳固的政治基础，中原未受干戈之乱，各种矛盾缓和，农业恢复发展，经济繁荣，工商业兴盛，大都市发达，这种歌舞升平的景象一直延续到徽宗、钦宗时期。反映到文学作品中，词这种新兴形式适合了艳情描写和描述市民生活的需要，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虽然诗歌和散文仍在广泛地反映着现实社会，但词的实用功能愈来愈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最终成为宋文学的时代特征。这个时期能在文坛上争得一席之地的山西籍文学家有司马光、王诜、毕仲游、米芾、米友仁等人。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河东夏县人。父司马池为宋天章阁待制，以清直仁厚闻于天下，号称一时名臣。真宗天禧三年（1019）十月十八日，司马池在光山县任知县时生子，故取名为光。司马光自幼聪颖过人，有破瓮救童的智举，京洛一带画成《小儿击瓮图》,争相传看。15 岁时已是“书无所不通，文词醇深，有西汉风”，为他后来从事史学研究打下了基础。仁宗宝元年间进士。皇祐元年（1049）枢密使庞籍深知司马光不同凡响，推荐他试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后来，庞籍出知郓州、并州，又以光为通判。庞死后，光待庞妻如母，待庞子如弟。嘉祐三年（1058）至八年（1063）间，司马光在开封任京官，与王安石、吕公著、韩维交往密切，号称“嘉祐四友”。治平四年（1067），英宗死，神宗即位，决意改变国家贫弱状况，起用众望所归的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司马光表示支持。但王安石大力推行新政，屡露弊端，且用人不慎，使司马光深感失望。他利用给神宗讲解《资治通鉴》的机会，上言曰：“安石诚贤，但性不晓事而愎，此其短也。又不当信任吕惠卿，惠卿奸邪。”但不被采纳，司马光此后十余年埋头写《资治通鉴》。后来王安石两次罢相，新政失败，司马光的声望则日益增高。苏轼做诗说：“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死，年幼的哲宗继位，太后听政。五月，司马光被任命为宰相，几个月中，将新法全部废除，恢复旧法。九月一日，司马光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京师人罢市吊唁，送葬者逾数万人。

司马光一生著述丰富，其中最著名的是《资治通鉴》294 卷。该书记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 404）至五代的 1362 年历史，是最大型的编年体史书。它由著名史学家刘恕、刘攽、范祖禹作成丛目长编，然后由司马光笔削润色，成一家之言。《资治通鉴》与《史记》相映成辉，人们并称司马迁与司马光为“两司马”。《资治通鉴》中的人物传记和战争描写，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司马光是写人的能手，写战争的能手。他笔下的战争，并不拘泥于写实战过程，笔墨主要放在突出战争胜负的条件上，如《赤壁之战》、《 淝水之战》。《赤壁之战》绝大部分是写决战之前孙刘双方通过外交穿梭确定的战略指导思想，使读者至此已明了决战结果了，而战况场面只略略带过。《淝水之战》主要刻画谢安的形象，历来为人称赞的结尾一段更为精彩。谢安得到驿书，知秦兵已败，却“了无喜色，围棋如故”，问他，则缓曰：“小儿辈遂已破贼”，极力掩饰自己的真情。可回内室跨门槛，便“不觉屐齿之折”，这真是神来之笔，把谢安由于心里兴奋，走路的步伐失常，从侧面写了出来。这一小段文字不多，刻画人物着重从神态动作入手，生动地写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即使在古文佳作中，这样的笔墨也是不可多得的。司马光的议论散文凿凿有据，洋洋洒洒，在宋代散文中独树一帜。如《与王介甫书》，是对老友王安石的新政提出批评，旁征博引，驰骋自由，行文波澜起伏，文笔淋漓酣畅，可谓滔滔而言，势不可挡。文章征引虽多，但一点儿也没有掉书袋。诗书孔孟、历史事件及现实，皆拿来为我所用，充分发挥了说理的作用。

司马光的诗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在宋代堪称一大家。他的诗内容丰富，覆盖面极广，触及到时代的各个角落。他曾长期闲居，有机会接触农村现实，农民的疾苦一直是他关心的主要问题。他写了许多诗反映农民的苦难生活。如《道傍田家》：“道傍田家，翁姬俱垂白：败屋萧条无壮息。翁携镰索姬携箕，自向薄田收黍稷。静夜偷舂避债家，比明门外已如麻。筋疲力敝不入腹，未议县官租税促。”写地主的租债剥削和官府的赋税过重，给农民带来的心里恐惧和赤贫生活。又如《夜雨宿村舍》：“积雨久未阕，岂徒行客忧。夜闻屋中人，叹息悲田畴。方春播植时，种食皆外求。鞭诃犯赤日，酷烈惭羸牛。草秽竞禾长，从人借锄耨。晨薅戴星起，日暗未能休。岂无一时勤，所觊岁有秋。今兹昏垫灾，大野成洪流……贩鬻固所昧，敢诧市井游。欲依盗贼群，懦不娴戈矛。已哉任天地，无益徒为愁。一身无死所，况为妻儿谋。”春旱秋涝，自然灾害不断，农民颗粒无收，被逼得乞食、流浪，或铤而走险为盗贼，而官府却无视这种社会现实。他在《苦雨》中写的“怯闻饥婴啼，愁听寡妇哭”；《喜雨》中写的“比屋起相告，荷锄行虽

歌”，喜忧之情皆系国计民生，随农人之喜而喜，随农人之忧而忧，体现了一位老臣的耿耿爱民之心。

西北边患也是司马光关注的重要问题，他写了许多边塞诗反映守边将士的艰苦生活和军中苦乐不等的现象。如《塞上》：“节物正防秋，关山落叶稠。霜风壮金鼓，雾气湿旌裘。未得西羌灭，终为大汉羞。惭非班定远，弃笔取封侯。”写自己渴望建功立业的壮志。《延安道中作》：“羁旅兼边思，川原喋血新。烟云长带雨，草树不知春。细水淘沙骨，惊飙转路尘。今朝见烽火，白首太平人。”写残酷的战争造成的巨大牺牲和灾难。《出塞》中写的“箱重征衣薄，风高战鼓鸣”；《塞上》中写的“落日衔西山，阴烟淡北关”，“如何逢汉使，犹未寄征衣。不叹千里远，难甘一信稀”；《相思亭》中写的“那堪陇头水，呜咽断人肠”，都体现了边塞的苦寒生活和战十的思乡之情。《边将》三首反映的是慷慨的出征场面和凯旋而归的壮观：“红旗一簇聚山椒，霁日清风看射雕。脱帽胡儿遥稽首，汉家新将霍嫖姚。”“月白星稀霜气多，卷旗束甲涉葖河。田家不觉官军渡，夜半只闻风雨过。”“横吹长笛千万骑，将军塞北立功回。边人争出孤城望，渐见旌旗天外来。”还有一些诗则写的是边将的骄横贪功和无能，如：“将军功未厌，士卒不须生”，“将军贵轻士卒，几人回首生还”，“自言不喜读兵法，智略何必求孙吴”。拿战士的鲜血和生命作为晋官加爵的代价，是司马光极力鞭挞的丑恶现象。

司马光的写景诗清丽自然，风格与梅尧臣接近，深得时人喜爱，有着很强的艺术性。如《客中初夏》：“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写雨后万物勃生，一片豁明，柳絮已被雨水洗净，葵花向阳生长，事物的新陈代谢在无声无息地运动着。再如《园中书事》：“芳洲晚日鲜，曲岸新雨好。红薇点圆荷，金蓑出幽草。”《湖上村家》：“万顶寒烟外，茅次枕碧流。枫林巢乳鹤，沙溆乱鸣鸥。漠漠菰蒲晚，苍苍芦荻秋。欲过南浦去，篱下出渔舟。”《寒食许昌道中》：“竹林近水半边绿，桃树连村一片红。”他笔下的自然界，五彩缤纷，鸟语啾啾，声色光既有流动感，又有静态美，读后令人如临其境，回味无穷。

《涑水纪闻》是司马光撰写的笔记小说，主要记载自宋太祖至神宗朝的政事，原为编写《资治通鉴后记》的资料。多数得之于传闻，每条皆注明述说之人，故称纪闻。由于是笔记小说，所写也就不受拘泥，自由开放，可读性强，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

比司马光稍后的王诜，是司马光、苏轼政治上的伙伴和文学上的密友。

他是本时期山西籍诗人中写词最多的一个作家。前期他过的是驸马都尉、诗酒美人的豪华生活，其词也就踌躇满志，闲散懒淡。如〔踏青游〕“金勒珽鞍”，写的是西园宴饮的欢乐生活，这曾在苏轼、秦观等人的词里多次出现，表现的是激扬文字、意气相投的诗友情趣。又如〔花发沁园春〕“帝里春归”、〔人月圆〕“小桃枝上春来早”等，从这些词里，可以看出他无忧无虑的生活，尽情尽意的享乐。晚期王诜屡遭贬谪，有机会接触下层社会，亲自体会到政治的险恶，使得他的词深沉凄凉，时有凄厉之啸。如〔行香子〕“金井先秋”、〔撼庭竹〕“月下风前空怅望”、〔落梅花〕“寿阳妆晚”、〔蝶恋花〕“钟送黄昏鸡报晓”等，在这些词里，他开始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体会到世态炎凉、人情淡薄的况味，从而性格变得深沉老练，一反前期轻狂颠放的人生态度。元丰八年（1085）他恢复自由回到京师，生活虽宽裕了，但心情却依旧忧郁，对名利淡薄如水。这在他的〔蝶恋花〕里体现得很明显：“小雨初晴回晚照，金翠楼台，倒影芙蓉沼。杨柳垂垂风袅袅。嫩荷无数青钿小，似此园林无限好，流落归来，到了心情少。坐到黄昏人悄悄，更应添得朱颜老。”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就这样在孤独寂寞中度过了他的晚年。王诜现存诗多写的是贬谪时的失落之感。如《湖上赠别》：“清影十分月，暗香千柄莲。不知从此别，高会复何年？”《奉和子瞻内翰见赠长韵》：“平生未省山水窟，一朝身到心茫然。长安日远那复见，掘地宁知能及泉。几年漂泊汉江上，东流不舍悲长川。苍颜华发何所遣，聊将戏墨忘余年。”《再和子瞻》：“忆从南涧北山边，惯见冷云和野烟。山深路僻空吊影，梦惊松竹风萧然。杖藜芒履谢尘境，已甘老去栖林泉。”这些诗韵调淡泊，深得庄老玄学之旨，与苏轼同时期的诗歌主题和风格是一致的。

毕仲游，字公叔，代州云中人。生卒年不详，约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在世，年 75 岁。元祐初，为军器卫尉丞，召试学士院，苏轼异其文，擢为第一。官至吏部郎中，堕党籍，坎坷而终。有《西台集》50 卷行世。诗歌以五古五律著称，风格清瘦硬朗，内容多写离别之苦和人世感慨。如《熙州蒋颍叔侍郎席上》：“仗钺出金门，投壶开玉帐。高秋沸箫鼓，万垒环青嶂。白云衬湖底，舟行若天上。绝胜后将军，峡中惟四望。”写军旅的生活环境，五六句尤为壮美。再如《曹南席上分题惊鹤》：“清风来九皋，月出寒夜永。故人闻鹤唳，惊起同引领。山遥声有怨，树暗飞无影。不若君子言，诗书日相警。”《破屋》：“破屋风千穴，檐疏日一竿。长巾笼短发，旧褐怯新寒。道路形容改，悲啼骨髓干。乾坤非不大，无地得闲官。”这些诗情调沉郁，字里行间渗透着难言的苦衷，仿佛用一层景物的

外衣把内心世界包裹得密实无缝，但我们还是可以体会到作者沉闷的心境和无以摆脱世事困扰的惆怅。

米芾世居太原，以行书、草书闻名于世。词风有如其人，放逸洒脱，不拘一格。如〔水调歌头〕《中秋》：“清明良夜，借我此地倒金瓯。可爱一天风物，遍倚阑干十二，宇宙若萍浮。醉困不知醒，敲枕卧江流”，写他举止癫狂，放荡不羁，难怪时人称他为“米癫”。其子米友仁，人称“小米”，善行书，文学作品以词著称，内容多抒写诗酒生涯，流露出对仕宦生活的厌恶和对自由生活的热爱。

（三）

靖康年间（1126），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北宋被金灭亡，南宋政权在杭州建立。反映在文学领域里，北宋词所呈现的柔婉靡丽的格调已与铁马金戈的时代气息难以适应，豪放粗犷的反映战争生活的爱国词应时而生，迅速崛起。代表这个开端的就是出将入相的山西籍爱国词人赵鼎，他开创了南宋辛派词的先河。还有另一位山西籍词人王安中，在晚期也写了许多爱国词。他们为南宋豪放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做出了贡献

赵鼎（1085—1147）字元镇，解州闻喜人。四岁丧父，由母教学，通经史百家之书，登崇宁五年（1106）进士。历任洛阳令、御史中丞、都督陕川荆襄军事等官职，两度入相，并享有“南宋贤相，首称赵鼎”之誉。

赵鼎现存诗不多，但气势很悲壮，写的是宋王朝南迁时的痛苦感情。如《趋三衢别故人时车驾杭州》：“伧父何由习楚风，家山俱在古河东。相逢憔悴干戈后，追数悲欢梦寐中。掺袂又成千里别，放歌空念一樽同。他年倘有加餐字，试问渔舟鹤笠翁。”又如《雨夜不寐》：“西风吹雨夜潇潇，冷烬残香共寂寥。要作秋山篷衣睡，正宜窗外有芭蕉。” 写南迁时与故国家园的依依难别之情，途中的黍离之悲，很感人。

赵鼎生活在离乱时代，一生写了很多词，大多反映的是自己在这个痛苦时代的感情变化。因而，他的词已脱尽绮罗香泽之气，处处流露着家国之恨和流寓之悲。靖康之难后，赵鼎被扣留在汴京，金人议立张邦昌，赵鼎与张浚逃太学，不书议状。在滞留期间，他曾写词以抒发心中的苦闷如〔虞美人令〕：“魂消目断关山路，曾送雕鞍去。而今留滞占陪京，还是一樽芳酒送君行。”又如〔蝶恋花〕：“尽日东风吹绿树，向晚轻寒，数点催花雨。词赋风流，不尽愁千结。望断江南音信绝，陇头行客空情切。” 赵鼎闻知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宗在杭州建立南宋政权后，就趁机偷偷南渡，在途中，他曾作词以记怀。如〔满江红〕，他自注：“丁未九月南渡泊舟仪真江口作”，词云：“惨结秋阴，西风送霏霏雨湿。凄望眼征鸿几字，暮投沙碛。试问乡关何处是，水云浩荡迷南北。但一抹寒青有无中，遥山色。天涯路，江上客。肠欲断，头应白。空搔首兴叹，暮年离拆，须信道消忧除是酒，奈酒行有尽情无极。便挽取长江入尊罍，浇胸臆。”又如〔河传〕：“应念夜长，旅枕孤衾不暖。”写秋夜旅怀，历尽艰辛，辛酸之味渗透字里行间。南渡后，赵鼎曾镇抚建康，与宗泽、李纲一起领导抗金战争。但朝廷中投降派势力很大，加之高宗意亦主和，使赵鼎深感失望，他在建康只能北望中原，愁肠寸断。如词〔鹧鸪天〕：“客路那知岁序移，忽惊春到小桃枝。天涯海角悲凉地，记得当年全盛时。花弄影，月流辉。水精宫殿五云飞。分明一觉华胥梦，回首东风泪满衣。”又如〔如梦令〕：“烟雨满江风细，江上危楼独倚。歌罢楚云空，楼下依前流水。迢递，迢递，目送孤鸿千里。”〔好事近〕：“羁旅转飞蓬，投老未知消息。却念故园春事，舞残红飞雪。”赵鼎和张浚为相时，张曾推荐秦桧可委以大任，赵不同意。但秦桧对赵毕恭毕敬，言听计从，很快就骗取了赵的信任，委以重权。野心家秦桧掌握实权后，嫉恨赵鼎，必欲除之。赵为远祸，出为奉国军节度使，徙知泉州。桧讽王次翁论之，安置潮州。詹大方知桧意，诬其受贿，移吉阳军。而桧意犹未已。赵鼎晚年受秦桧迫害，流寓无所，自知难免，思归故园又不能，心情极为悲伤凄凉。在他的词里体现了这时的感情变化。如〔行香子〕：“举头见日，不见长安。谩凝眸老泪凄然。山禽飞去，榕叶生寒。到黄昏也，独自个，尚凭阑。”〔贺圣朝〕：“征鞍南去天涯路，青山无数，更堪月下子规啼，向深山深处。凄然推枕，难寻新梦，忍听伊言语。更阑人静一声声，道不如归去。”〔浪淘沙〕：“霜露日凄凉，北雁南翔。惊风吹起不成行，吊影苍波何时恨，日暮天长。为尔惜流光，还是重阳。故人何处倚危樯，寄我相思千点泪。直过潇湘。”这位伟大的爱国者就这样被迫绝食而死，时绍兴十七年（1147）。

王安中，字履道，阳曲人。生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卒于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哲宗元符三年（1100）进士。徽宗政和年间，累擢中书舍人，御史中丞。钦宗靖康初，为象州安置。高宗绍兴初，复左中大夫。王安中有文才，尤工骈体，有《初寮词》传世。

王安中的诗多为应制诗。徽宗尝宴睿谟殿，命安中赋诗百韵，以纪其事。王安中写了《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就睿谟殿张灯预赏元宵曲燕应制》诗，洋洋洒洒千余言，徽宗赏叹不已，令大书于殿屏，凡侍臣皆以副

本赐之。这使王安中诗名大震。他写的《王摩诘钓鱼图》诗自然朴实，天趣盎然。如云：“我本江湖人，市朝岂无心。偶然坠世网，如鸟思长林。”“我时坐其旁，清风溢幽衿。归来步长廊，缺月户半侵。”王安中的咏花小诗清丽淡雅，很有韵味。如《长春花》：“露桃烟杏逐年新，回首东风迹已陈。顷刻开花公莫爱，四时俱好是长春。”《山茶》：“无穷芳草度年华，尚有寒来几种花。好在朱朱兼白白，一天飞雪映山茶。”

王安中现存词 50 余首，在两宋山西籍词人中是首屈一指的。由于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北宋后期，受艳词的影响很大，故许多词也有着柔婉的情调。徽宗末年，金兵南侵，边患日急，战端四起。面对民族的生死存亡，王安中也曾热血汹涌，积极主张抗战。因此，在他的一些词里，流露出对卫国官兵的热爱和一定的民族忧患意识。如《菩萨蛮》：“中军玉帐旌旗绕，吴钩绵带明霜晓。铁马去追风，弓声惊寒鸿。分兵间细柳，金字回飞奏。犒饮上恩浓，燕然思勒功。”气势豪放，很有气象。再如《木兰花》：“尧天雨露承新诏，珂马风生趋急召。玉符曾将虎牙军，金殿还升龙尾道。征西镇北功成早，仗钺登坛今未老。樽前休更说燕然，且听阳关三叠了。”是送一老将出征时祝酒歌。南渡后，王安中曾一度被贬闲居。国破家亡，加之个人命运的不幸，抒写对往昔生活的思恋和对故国的怀念之情，就成为他后期词的主题。

二

中国历史上的辽、金两代，与唐朝以后的五代十国和两宋并存达 300 余年。辽代（916—1125）与五代和北宋并存；金代（1115—1234）与辽、北宋、南宋并存。就文学活动来看，还应包括金亡后遗民作家的创作在内，如段成己（1199—1279），这样就延续到 13 世纪 70 年代，与元朝相衔接。

在这由契丹族和女真族统治中国北方的 300 多年中，产生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然而由于民族偏见的影响和战乱的破坏，辽金文献大多数散佚无存。辽诗今存者不足百首，20 余种文集则无一幸存。金人别集百种，只有《遗山集》、《庄靖集》、《二妙集》、《明秀集》、《《滏水集》、《拙轩集》、《滹南遗老集》 7 种幸存于世。但辽代萧观音的诗词，已可谓精彩绝艳，而元好问的文学成就之高，更为学界认同。由此不难想见，辽金文学的总体质量，当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民族的交融和地域文化、自然环境

的不同，辽金文学具有迥异于宋代文学的特质，无柔弱纤仄之弊而有质朴刚健之骨，多抒情白描而少议论藻绘。因此，辽金文学实为中国文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在山西古代诗歌史上，金代诗词是最为光辉的一页。《中州集》所收251位诗人中，山西诗人竟占一半以上。金诗发展的全过程中，每一个时期都有山西诗人倡领风骚，而山西忻州文学家元好问，则已是公认的金元两代文坛宗师了。

以下将辽金两代山西文学分而述之。

（一）

辽代于公元916年建立时称契丹，公元947年改国号为辽，983年又改为契丹，1066年又复称辽。辽代200余年来，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较大的发展，对祖国北方疆域的稳定和中华各民族的融合、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辽代文献今所见极少。但仅就现存文学作品看，如萧观音的诗词，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在具有质朴刚劲独特风貌的辽诗中，以汉化倾向的柔婉见称。

辽太祖阿保机称帝不久即建孔庙，命皇太子春秋释奠，并亲临祭祀。《辽史·文学传序》说：“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辽代文学深受唐宋文学的影响，特别是白居易和苏轼的作品，被普遍尊崇和仿效。辽圣宗亲译《白居易讽谏集》，自云“乐天诗集是吾师”。阿保机的长子东丹王耶律倍仿“白居易字乐天”给自己取名“黄居难字乐地”。苏辙《使北诗》说：“逢见胡人问大苏”，“北使屡诵三苏文”。辽圣宗以后，文化日益繁荣，作者渐多，写作技巧也日趋成熟，诗文作品大量出现。辽人别集，如刘京的文集达40卷，契丹作家萧柳有诗千余篇，集为《岁寒集》。由于科举试士列词赋为正科，吟诗作赋已成风气。辽太宗、圣宗、兴宗、道宗及东丹王耶律倍皆喜吟咏，并热心提倡文学。圣宗还曾制曲百余首，道宗则有《清宁集》行世。流入北国的中原文人颇受重视。如李瀚，仕晋为中书舍人，晋亡归辽，授翰林学士。辽枢密使高勋认为他“富于文学，方今少有伦比，若留掌词命，可以增光国体”（《辽史·文学传》）。李瀚有《丁年集》，亦佚。1974年，山西应县辽佛宫寺释迦塔四层主像内发现辽代秘藏，其中有李瀚《蒙求》3卷，为四言诗刻本，共596句。亦见《全唐诗》

卷八八一。

值得一提的是寺公大师的《醉义歌》，为现存辽诗中最长的诗篇，原为契丹文，耶律楚材译为汉文，共120句、842字。“无论是思想内涵的丰富性，还是艺术表现的成熟性、审美思想的创造性等方面，都可以说是雄踞于辽诗之巅的一首长篇杰作”（张晶《辽金诗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短篇的佳作则首推辽道宗的《题李俨黄菊赋》：“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意想空灵，含蕴无尽，置于唐宋诸贤之作中亦可无愧。至于萧观音的《回心院》、《绝命词》等诗词，学界早有极高的评价了。

辽代的山西作家，生活在这样的文化艺术氛围中，作品虽大量佚失，但其质量当不难想见。就仅存的点滴资料来看，云中（今山西大同市）释道殿之诗文“精隽简约，渊奥赅弘”、“尽善尽美，兼质兼文”（《密显圆通成佛心要集》后序）。应州（今山西应县）学者邢抱朴创建了龙首书院，辽景宗时为翰林学士，圣宗时纂修《实录》，与其母陈氏、弟抱质均擅长诗文。广陵（今山西广灵县）人刘元英为辽进士，后入道，有诗集行于世。今存其诗《题潭州寿宁观》，五言仄韵20句，写其道士生涯，诗艺已十分成熟。《金文最》载王庭直《刘海蟾堂移石刻记》说其诗“高风莫能企及”。孝义县僧宗印有《题佛刹》七律传世，格律严整，忧国忧民，难能可贵。

被公认成就较高的辽代山西文学家是虞仲文（1069—1123），武州宁远（今山西朔州）人。今存《雪花》诗，被认为“极有神韵，写出雪花的洁白飘逸。……使雪花的意象显得悠远神秘。四岁能写出这样玲珑隽永的小诗，殊为难得”（《辽金诗史》）。虞仲文还有一篇《宁鉴墓志铭》传世，文笔典雅流畅，情真意挚，足称佳制。

辽代小说、戏曲亦有发展。今存王鼎《焚椒录》是成熟的文言短篇小说，文备众体，可见史笔、诗才、议论。描绘细腻，叙事周密、生动、真切，人物形象十分鲜明感人，其中收录了萧观音的全部诗文创作，更具文献价值。

辽兴宗夜宴时，自己加入伶人乐队，并命后妃易衣为女道士，参与戏剧表演。《焚椒录》记萧观音（1040—1075）召单登与赵惟一对弹琵琶，已有“四旦二十八调”。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今观《辽史·乐志》……又有四旦二十八调……所谓旦，乃司乐之总名，以故金元相传，遂命歌伎领之，因以作杂剧。流传至今，旦皆以倡女充之。”《辽史》还有以杂剧招待宋国使臣的记载。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认为“辽金之剧皆自宋往”，

恐不尽然。

1974 年，在山西应县辽代木塔中还发现了一批讲经文、变文、俗曲和木板佛像画，证明俗文学在辽代也较流行。如《大乘杂宝经》变文，引用了韩信、季布、庞涓、孙膑的历史故事，可看出变文向汉化的白话小说演化之迹。

从公元 937 年起，山西雁北地区被石敬瑭割让给辽，直到 1125 年辽朝灭亡前，均属辽管辖。辽以大同为西京，设国子监，成为当时北方文化的一个中心。雁北著名古建筑，如大同观音堂、善化寺大雄宝殿、天镇慈云寺、灵丘觉山寺、朔州崇福寺等，皆为辽建。觉山寺和大同华严寺的辽代雕塑佛像，姿态优美自然，表情生动，极富世俗情味，已不具有神秘感。云冈彩饰造像群达 1876 尊。应县佛宫寺木塔，是世界上现存最高大的古代木建筑，建于辽兴宗清宁二年（1056）。塔高 67.13 米，平面 8 面 9 层，底层直径达 30 米。塔建成 200 多年后，元顺帝时曾经历大地震 7 日，仍巍然屹立无损。塔内佛像神态各异，最大的一尊坐像高达 11 米。

（二）

《金史·文艺传》称：“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所谓“以文而不以武”，从广义上讲，是指女真族统治者对先进汉文化的主动吸纳和融合，从而加速了封建化的过程。这种过程，早在“得国”之前已经开始。《金史·礼制》载：“金人之入汴也，时承平日久，典章礼乐粲然备具。金人既悉收其图籍，载其车辂、法物、仪仗而北。……海陵志欲并吞江南，乃命官修汴故宫，缮宗庙社稷，悉载宋故礼器而还。……世宗既兴，复收向所迁宋故礼器以旋，乃命官参校唐、宋故典沿革，开‘详定所’以议礼，设‘详校所’以审乐。”在科举取士方面，“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金史·选举志》）。金承安五年科举经义榜，考中进士的，山西文人达 1/3。

少数民族政权的封建化过程，实即汉化过程，亦即广义的文明化过程。这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其初级阶段却往往是通过暴力的形式来实现的，其间充满了血与火的灾难，生与死的较量，是不同民族文化碰撞、渗透、交融的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这一阶段需要经过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奋斗牺牲才能完成。例如金初的文学“国师”宇文虚中，原是宋朝的黄门侍郎，

天会六年（1128） 因奉使被留，仕金为翰林学士承旨。他非常看不起文化落后的女真贵族，“恃才轻肆，好讥讪，凡见女直（女真）人，辄以矿卤目之”（《金史·宇文虚中传》）。他曾计划以武力胁迫金主，放宋钦宗赵桓以归，“前五日为人告变。虚中觉有警，急发兵，直至金主帐下，金主几不能脱。遂为所擒，全家皆死”（据《北窗炙輠录》）。高士谈也连累被杀。还有海陵王完颜亮时的翰林直学士施宜生，在被派往宋贺年时，暗示南宋要加强备战，还金后被告发，遭烹死。金初由宋入金的山西诗人，其经历虽不如宇文虚中、施宜生那样典型，但眷恋祖国、故乡的思绪，却是基本一致的，这成为金初诗歌内涵的深深的情结。这时期有一位著名诗人姚孝锡（1099—1181），他虽是江苏丰县人，但从 29 岁直至 83 岁逝世，50 余年来从未离开山西，定居于山西五台（今五台县）。遇到灾荒年景，他还拿出自家的粮食救济饥民，很受百姓拥戴。他的《睡起》诗云：“旧事老年多记忆，故园归梦正悠扬。”仍念念不忘地吟唱着故国之思，所谓“故园”，实即“故国”也。《中州集》收其诗 32 首，实为金初山西诗坛第一大家。

法国文学批评家斯达尔夫人认为：“对当时各民族来说，蛮族的入侵当然是一场严重的灾难，然而文化却正因此得到传播。在与北方民族混杂的过程中，委靡不振的南方民族从他们那里汲取了力量，同时使北方民族汲取了有助于充实智能的灵活性。”（《论文学》中译本，第 107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年版）这使我们很自然地想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战争中征服与被征服的名言，即落后民族以武力征服先进民族之后，却不能不被先进民族的文化所征服。这确是一条历史规律。而斯达尔夫人的新见在于：委靡不振的南方民族也从蛮族那里汲取了力量，即指出了不同民族文化的双向互补性。金诗的创作实绩绝妙地体现了这一点。

金代山西文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方面。我们基本赞同张晶先生《辽金诗史》提出的金诗分期法：四个阶段。一是从金太祖到海陵朝（1115—1161）为“借才异代”（实为“借才异族”）的金初时期。二是世宗、章宗两朝（1162—1213），是金诗成熟，形成“国朝文派”的阶段。三是从“贞祐南渡”（1214）到金亡（1234），为金诗的繁荣期。四是从金亡至“河汾诸老”的最后一位遗民诗人段成己（1199—1282）逝世。这是金诗的高潮期。虽然金王朝已灭亡，但金诗人还在，而且不少诗人正进入创作的高潮。如元好问金亡后生活、创作了 20 余年，登上金代诗坛的顶峰，“河汾诸老”等金代遗民诗人，也在此期间创作了不少可歌可泣的佳作，并对元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金初“借才”期

清人庄仲方在他所编的《金文雅》序中说：“金初无文字也，自太祖得辽人韩昉而言始文。太宗人宋汴州，取经籍图书，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辈先后归之，而文字煨兴，然犹借才异代也。”这段话是当时南北文化融合、金初由朴陋而逐渐文明的简洁概括。其中“借才异代”一语，若将“代”改为“族”，似乎更为准确。所谓“借”，生动地反映了女真族统治者对汉族先进文化的仰慕和主动吸收，客观地再现了不同民族文化并存、融合的实况。这一时期被“借”的山西之才士，由辽入金的主要为虞仲文，由宋入金的除前已提到的姚孝锡外，还有山西夏县人司马朴以及滕茂实、朱弁。他们三人都是由宋朝使金被留在山西的。滕、朱二人并非山西籍，但在山西生活和创作多年。朱弁之诗，《中州集》收入 39 首，另有《风月堂诗话》、《曲洧旧闻》等著作传世。他滞留于山西大同等地近 20 年，写了很多诗文。今有大同善化寺的金碑，镌刻着朱弁写的一篇寺院重修记，颇为后人传诵。还有一位山西代县人何宏中（1097—1159），字定远，原为宋军将领，被金人俘获后抗节不降，囚于狱中。后被保释出狱，当了道士。他被擒后曾作《述怀》诗云：“马革盛尸每恨迟，西山饿踣更何辞。姓名不到中兴历，付与皇天后土知。”表达宁死不降的志节。曾有一位州将赠何宏中诗云：“故人何定远，造物不虚生。骨骼稜稜瘦，诗篇字字清。世皆尊道艺，我独见忠诚。尊酒分携后，何时盖复倾。”可见其为人和诗艺。

跨越第一、第二两个时期的著名山西诗人，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是李晏、刘汲和郝俣。

李晏（1123—1197），泽州高平（今山西高平市人），金熙皇统六年（1146）进士，累官至礼部尚书。为人刚直敢谏，深得金主信任。作昭毅军节度使时，为救灾民，不及请示，擅发官仓粟 3 万石解泽潞百姓之饥，金世宗认为义当如此，并不责怪。李晏的诗词流露出对仕宦生涯的厌倦以及对世事兴亡、人生无常的感慨。因其久涉官场，洞悉宦海风波之险，而又不便明言，故形诸歌咏。他的〔回文菩萨蛮〕词，饶有情趣，表现了其成熟的诗艺，但也同样寄托着知己寥落之叹。

刘汲（1151 年前后）是应州浑源（今山西浑源县）人，出身文学世家。他的父亲刘㧑，号南山翁，是当时的诗学宗师，金初词赋状元。元初文学家王恽所撰《浑源刘氏世德碑铭》说：“金源立国，网罗才雄。首魁多士，惟南山翁。程文妙绝，一世师宗。”又指出：“金国一代词学，精切得人为盛，由公有以振而起之也。”刘汲为金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进士

刘家自刘抃始，共有 8 人中进士，时人有“八桂堂”之誉。刘汲著有《西岩集》，当时的文坛领袖李纯甫为之作序，称其诗“质而不野，清而不寒，简而有理，淡而有味，盖学乐天而酷似之。……凡一篇一咏，必有深意，能道退居之乐。皆诗人之自得，不为后世议论所夺，真豪杰之士也”（《中州集》卷二）。刘汲的《西岩歌》，豪放不羁，颇有野逸之气，对形成金诗的“国朝文派”，有明显影响。

太原诗人郝俣，《中州集》录其诗 21 首，是金初山西诗人中存诗较多的。郝俣为海陵王正隆二年（1157）进士，仕至河东北路转运使。今存诗以五言咏物诗和七律为主，意象高洁，物我交融，寄托着自己不慕荣利的恬淡情怀。

这一时期的山西诗人有 20 余人。

2. 成熟期

元好问在《中州集》卷一蔡珪传中指出：

> “国初文士如宇文大学、蔡丞相、吴深州之等（按：指宇文虚中、蔡松年、吴激），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故断自正甫（蔡松年之子蔡珪）为正传之宗，党竹溪（党怀英）次之，礼部闲闲公（赵秉文）又次之。自萧户部真卿（萧贡）倡此论，天下迄今无异议云。

这一段话至为重要，它揭示了金代文学发展的主脉和各阶段的代表人物，即蔡珪——党怀英——赵秉文——元好问。

蔡、党、赵的“国朝文派”正传文脉，首先是由萧贡提出的。萧贡字真卿，咸阳人，大定二十二年（1182）进士。元好问称其：“博学能文，不减前辈蔡正甫……预修泰和律令，所上条画，皆委曲当上心。兴陵（金世宗完颜雍陵墓，代指世宗）嘉叹曰：‘汉有萧相国，我有萧贡。’……以户部尚书致仕。”（《中州集》卷五《萧贡传》）可见，萧贡实在是一位促进金朝汉化的重要人物，由他提出“国朝文派”的传承是理所当然的。元好问《中州集》选萧贡诗达 32 首，其诗也正具有“国朝文派”的基本特征。

我们先看“正传之宗”蔡珪的诗。《中州集》录其诗 46 首，最能代表“国朝文派”初期特色的一首是《野鹰来》：

> 南山有奇鹰，置穴千仞山。网罗虽欲施，藤石不可攀。鹰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